

## 二十世紀50、60年代

###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幾次批評

◎ 賈艷敏

《人民日報》創刊於1946年5月15日。最初是作為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的機關報，在河北邯鄲創刊。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時，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聯成了一片，1948年5月，兩個解放區合併成為華北解放區，中共華北中央局決定原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日報》與原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日報》合併為中共華北中央局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需要一張全國性的報紙，1949年8月，改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

《人民日報》由邊區機關報而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從創刊到全國解放，對於發動人民，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宣傳作用。建國後的最初幾年，《人民日報》能夠緊跟政治形勢，發揮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作用。然而，從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也就是中央在指導方針上轉向「左」傾，直到文革爆發，《人民日報》越發跟不上形勢，「大躍進」時期曾一度緊跟，放了一些糧食、鋼鐵「衛星」，但當中央著手糾正「大躍進」的「左」傾錯誤時，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在「文革」前夕一心想緊跟卻不知風向，找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在哪里，最終逃脫不了被奪權的命運，主要領導被隔離審查，《人民日報》成為文革的鬥爭工具。

#### 一、1956年一篇社論被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

1956年國民經濟各項計畫劃指標超過了實際可能，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主持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多次壓縮計劃指標。但仍有人對急躁冒進的危害認識不足，1956年5月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討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起草文件問題，會議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劉少奇提議中宣部就此方針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sup>1</sup>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會上講話中宣佈：「反對右傾保守，現在已高唱入雲，有必要再提一個反對急躁冒進。中央要我們寫篇社論，把兩個主義反一反。」<sup>2</sup>隨後中宣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草稿，經過陸定一、劉少奇、胡喬木修改，發表於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了反對急躁冒進。<sup>3</sup>這篇反冒進的社論因不符合毛澤東「多快好省」的經濟建設思路，而被多次嚴厲批評。

1956年10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經濟有進有退。「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後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

了。淨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sup>4</sup>這其實是在非常委婉地批評了《人民日報》6月20日的社論。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是批評反冒進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發動「大躍進」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上，《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的社論再次成為毛澤東批評的靶子。毛澤東說，《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反冒進的社論是非常錯誤的。<sup>5</sup>「把我的話掐頭去尾，只引反『左』的，這不對。不引全段話，是『秦瓊賣馬』，掐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sup>6</sup>這是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了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甚麼要看？那麼恐慌，那麼動搖。只有一個指頭有病，是九與一之比。這篇東西沒有弄清這個比例關係，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像陳叔通、黃炎培、陳銘樞的方法。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批評。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講的一段話，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而在反右傾保守，要引就應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開，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煩我，二可利用我打別人。<sup>7</sup>為了徹底批判這篇社論，毛澤東把《人民日報》社論的摘要在會議上印發，並且加上批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針對我的。」並且把這篇社論作為當時中央一些同志『反冒進』的證明。他還不惜花費時間，對社論進行逐段逐段的批判。

毛澤東指出，《人民日報》的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只有五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毛澤東念了社論中的一段話：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在採取一系列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

唸完這段話後毛澤東說：「這是說，中央已經下決心反冒進了。」他再唸社論的一段話：「各個部門和各個地方的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有些還未糾正，或糾正得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則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在今後經常注意。」

接下來，毛澤東評論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反冒進」。他說，急躁冒進究竟從何而來？《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毛澤東評論說，這一段話是尖銳地針對我的。他接著說，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後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地向前發展。」你說這話不對？這是對的啊！但是，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你看，這篇社論下面接著說，「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

才能正確地前進。」他說，這篇社論的落腳點是落在反對急躁冒進，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論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後面。

他還說，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sup>8</sup>

後來在關於《人民日報》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又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6月20日社論有原則性的錯誤，……不能說這篇社論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在『但是』以後就是反『左』，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東林黨內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裏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實是說東林皆小人。前面講少數如何，後面講多數如何，形式上兩面反，實際上是反『左』，反『冒進』。……革命就要跳躍。個別缺點不可免，要分清是九個指頭還是一個指頭。工作中『左』一點、右一點是正常現象，問題在於方針、方向如何。以後不要提『反冒進』，決不要提。」<sup>9</sup>

## 二、1957年初跟不上形勢遭到痛罵

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一篇重要講話，6月19日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兩次會議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前者只發了一條不足兩百字的消息，對後者一點沒有涉及。對此，毛澤東非常生氣。4月10日，《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以及全體編委被通知到毛澤東的住處去。毛澤東對鄧拓和《人民日報》進行了痛罵：「已經發表的幾篇社論沒有聯繫最高國務會議，好像沒有這回事。」

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從陳其通的文章，最高國務會議後，《人民日報》無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該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

宣傳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是黨內外召開的，為甚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甚麼不發社論？為甚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裏有鬼，鬼在甚麼地方？

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你們的意見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評鄧拓。要敢於給鄧拓提意見，頂多是撤職。鄧拓要好好當劉備，劉備會用人。我看你當了皇帝會亡國，你很像文、景、哀、平。你不要把茅坑不拉屎。中央開了很多會，你們參加了，不寫，只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們就不必來開會了。誰寫文章讓誰來開會。<sup>10</sup>

這樣劈頭蓋臉的痛罵把鄧拓等人打蒙了，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壓力。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止批評。

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表揚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時，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不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精神。他說，《人民日報》能結合形勢寫出這樣好的元旦社論，為甚麼去年就成了死人辦報？毛澤東又當眾批評鄧拓不宣傳

1957年初的兩次會議。當鄧拓一走進會場，毛澤東當著與會者的面說：

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文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談起。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鄧拓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死人辦報。<sup>11</sup>

毛澤東的這些批評似有理而實無理。《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哪些重大事情能登報，哪些不能登報，這不是總編輯鄧拓所能決定的。面對嚴厲的批評，鄧拓說自己水準不行，不能適應要求，請求辭職。這使毛澤東更加憤怒。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感到無所適從，毛澤東對鄧拓也越來越不滿意，195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任社長。8月，鄧拓離開《人民日報》。

### 三、「大躍進」中緊跟形勢仍然挨批

南寧會議之後，「大躍進」的空氣日益濃厚，《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幾篇較重要的社論，如《鼓起幹勁，力爭上游》、《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從這時起，《人民日報》的宣傳緊跟「大躍進」的形勢，向「左」傾斜，對「大躍進」的發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銳曾引用劉少奇的話說：「大躍進」的發動，《人民日報》要負一半的責任。<sup>12</sup>

南寧會議大反右傾，成都會議和武昌會議的主旋律是鼓足幹勁，到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解放思想、敢想敢幹的呼聲壓倒一切。《人民日報》的宣傳報導也緊跟形勢的發展。夏收之後，農業上開始放「衛星」，6月8日《人民日報》放了第一顆小麥「衛星」，接著就是「衛星」滿天飛，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氾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導，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颯起一股共產風。<sup>13</sup>如《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等）、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導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趕我追」，大搞浮誇。因此，可以說《人民日報》不僅對「大躍進」的發動要負一半的責任，對「大躍進」狂熱的「浮誇風」也要負一半的責任。

「大躍進」的「左」傾蠻幹到1958年底顯現出了惡果。中央高層從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進行了8個月的糾「左」。隨著中央政策的調整，《人民日報》在1958年對浮誇的宣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談到報紙宣傳問題。他說，《人民日報》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sup>14</sup>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傳如何轉的問題。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在談到宣傳問題時，批評了《人民日報》，他說，《人民日報》去年出了很多亂子，要加以改進。<sup>15</sup>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總的說，反右鬥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現在的問題是改正缺點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sup>16</sup>

#### 四、文革前夕對《人民日報》的批評

1964年6月21日，政治局常委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對吳冷西說，今天找你來是要批評你，批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他說，《人民日報》1961年發表了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沒有檢討，也沒有批評「有鬼無害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就提出抓階級鬥爭，但《人民日報》對外講階級鬥爭，發表同蘇共論戰的文章，對內不講階級鬥爭，對提倡鬼戲不作自我批評。這就使報紙處於自相矛盾的地位，並指著吳冷西說，你搞中蘇領導論戰的文稿，一年多沒有抓報社工作。你一定要到報社開個會，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講一講，也同新華社講一講。毛澤東還說，《人民日報》的政治宣傳和經濟宣傳是做得好的，國際宣傳也有成績。但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不抓理論工作，從報紙創辦開始我就批評這個缺點，但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問題。<sup>17</sup>

毛澤東對文藝界的不滿，表現在對文藝的兩個批示上。而江青把毛澤東的兩個批示作為尚方寶劍，開始行使她的文藝界「哨兵」的職責。1964年底，江青約中宣部5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溱）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十部影片。這十部影片有《不夜城》、《鄰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及《白求恩》等。當時大家都沒有同意，認為要慎重考慮。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仿效。在這樣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這期間，還開展了其他領域裏的批判，如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文學界批判了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歷史學界批判了翦伯贊、吳晗等人的「讓步政策」等。

鑒於這些錯誤的批判有大氾濫之勢，中央書記處於1965年3月初開會討論此事。鄧小平和彭真都主張趕快「煞車」，學術討論要「降溫」。《人民日報》先後發表評論和其他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學作品。《人民日報》先後開闢了許多專欄，繼續宣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如設計革命、為革命做生意、組織工業生產高潮、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習毛主席著作、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學王傑、學焦裕祿、縣委革命化等等，都受到比較好的效果。<sup>18</sup>然而，《人民日報》的種種努力還是沒有阻擋大批判的惡浪。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後的十幾天，除華東地區各省報和其他少數省報轉載外，中央報刊和多數省市報都反應冷淡，特別是《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等有影響的報紙沒有轉載。這篇文章本來是「文革」的發動者甩出的一塊「石頭」，當然希望這塊石頭擲地有聲，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種尷尬局面。11月下旬，毛澤東看到沒有多少報紙轉載，就命令上海印單行本，在全國發行。這時《人民日報》才似乎感覺到了一點姚文元文章的非凡來歷，在姚文元文章發表後20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學術研究」專欄裏轉載，報社還是希望這是一個學術爭鳴。總編輯吳冷西主持寫了「編者按」。編者按還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強調要貫徹「雙百方針」，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sup>19</sup>這樣的編者按所表明的態度和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的初衷相違背，因此又招致毛澤東嚴厲的批評。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批評吳冷西說，《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經提倡學習「海瑞精神」，胡喬木請吳晗為《人民日報》寫一篇比較全面評價海瑞的文章，6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的《海瑞罵皇帝》，9月發表了吳晗的《論海瑞》的長文。1960年吳晗寫成《海瑞罷官》的劇本（劇本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觀點上是一致的。）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毛澤東又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sup>20</sup>

從此，《人民日報》越來越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接替鄧拓任總編輯的吳冷西一度被毛澤東看好，這時也感到摸不著風向了。就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調離職務，一個月後，即1965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批判，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被批判，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批判。從而製造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形勢，《人民日報》更是無所適從。作為「文革」發動的重要步驟——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6月1日座談會，透露其精神的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也是在其他報紙發表後《人民日報》轉載的；收錄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論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首先在《解放軍報》發表，第二天《人民日報》轉載。這種一心想緊跟風向，又不知風颳向哪里的狀況，直到5月31日下午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在《人民日報》「搞了個小小的政變」，奪了吳冷西和編委會的權。第二天，即6月1日，殺氣騰騰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衝鋒號，《人民日報》從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

## 註釋

- 1 陳紹疇、劉崇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68頁。
-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 3 《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情緒》是反冒進的一篇重要社論，也正是這篇社論後來遭到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周恩來、陳雲等人多次為之作檢討。
- 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4頁。
- 5、8、13、14、15、16、17、18、20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48頁、49-51頁、第72頁、第136頁、第141-142頁、第140-141頁、第145頁、第149頁、152頁。
- 6 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第190頁。
- 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64-65頁。
- 9 顧行、成美《鄧拓傳——一個畢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9-80頁。
- 10、11 張帆：《才子鄧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頁、第260頁。

1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頁。

19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頁。

賈豔敏 安徽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史。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四期 2007年7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四期（2007年7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